

大象
学术
译丛

西方现代史学经典

[德]夏 德 著

朱杰勤 译

大秦国全录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四 大象出版社

大秦国全录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德] 夏 德 著

朱杰勤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国全录/[德]夏德著;朱杰勤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王秦伟主编)

ISBN 978-7-5347-5030-4

I. 大… II. ①夏…②朱… III. 世界史:近代史—研究
IV. 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069 号

大象学术译丛 | 西方现代史学经典

大秦国全录

[德]夏 德 著 朱杰勤 译

责任编辑 杨吉哲

责任校对 李建平

书籍设计 美 霖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大象学术译丛

主 编

陈 恒

王秦伟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8年12月8日

自序

我虽然希望本书所载的各项研究,能够投合各国少数读者的兴趣,但我必须承认,笔录研究结果时,是企图满足德国的批评家而非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我既然曾经在利特什尔(Ritschl)及荷普(Haupt)等大师门下研究过语言学的方法,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这些文章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于选择与古代事实有关的权威的方面。我曾经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资料,这在幸而能置身欧洲皇家图书馆以进行他们研究工作的作家看来,是不能谅解的。因此,我必须说明,这些文章是在中华帝国的上海的忙乱生活中写成的;在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搜罗最必要的材料时,主要只好靠本人有限的书库所藏的中外文著作。对西方作家来说,这显然是个大缺点;援引中国的作家时,也几乎有同样的困难。因为对住在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不管在个人进取方面提供什么样的便利,但如果因而就推论说,住在这个帝国内的外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大量的中国书籍,特别是那些只有购置机会才能获见的珍本,那就错了。在巴黎、伦敦、柏林、慕尼黑和圣彼得堡的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所有重要和有趣的中文著作,在那里进行这一类的研究,自然容易得多。

我对于德国批评家还要另外表示歉意。我国的语言学家或许会问,你既能用本国文字写作,为什么还要用英文写作呢?为什么你舍弃熟练的德文而反用你自己拙劣的英文呢?我必须承认,未动笔时,已考虑两种文字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在一开始便使我煞费踌躇。但最后,由于实际的理由,决定冒受采用外文所会遭遇的一切困难危险。这本书总得在一个地方排印,如果在德国付印,而我不在其地,则排印汉字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在上海付印,则作者势必要去谙悉许多他过去没有机会学习过的印刷技

术。法人德·斯塔埃尔夫人(De Stael)说过,德文是我们应该用于思想的文字,英文是我们应该用于写作的文字;事情既是这样,我似乎最好接受她的忠告。德国的汉学家大多识英语,这使我稍为自慰。我所引以为憾的,一般研究古典时代的学者,未必都是如此,因此我的文章中有些由于缺乏专门研究而留下来未能解决的困难,将不能得到许多研究古东罗马的鉴别专家的见教。

自上世纪(18世纪)初以来,汉学界对于中国旧籍中所载泰西国家“大秦”的问题,时有争论。关于这个有趣的题目,我认为有待去做的工作有:

一、收集与此题有关的中国典籍中的文字。

二、把其中未经译出的文字翻译出来,并把过去译文中译得不够完善的部分加以重译。

三、考证上项文字中所记的事实。

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菻的,并非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Syria)、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Roman Orient),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说法就与实际不符。我所读的中国书,其中关于当时亚洲西部的地理,有相当正确的记载;如果把它们应用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那就必如玉尔上校(Colonel Yule)在他的《契丹》(Cathay)一书中某处所说的成为“幼稚的胡言乱语”了。^[1]

玉尔论及古代西方地理学家关于“秦”(Thinae)国的知识时说:“在知识不充分的情形下,把比较远而称霸民族的名称加于与它最邻近的隶属的种族上,和把这些最邻近的种族的特点移之于称霸的民族,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荷兰 Dutch 的名称专应用于我们邻邦的 Netherlands,亦与上例大同小异。”(《契

[1] 《契丹》一书全名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契丹及其通道》),亦名东游丛录,是欧洲中古时代关于16世纪前中国的各种记载,由玉尔编译而成,初由英国哈克卢特学会出版,共四册,后由法兰西学院教授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重新编定。——译者

丹》,第1卷,第63页)同样的评语,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上古及中古的作者对于大秦拂菻的特点的意见。但我们必须再加说明的,统治民族(罗马)的许多特点虽然见之于被统治的叙利亚,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知的大秦还受一个更大的大秦的统治。他们以为安都(Antioch)即大秦的首都,独擅繁华,在东方游历家看来,遥远的罗马首都的伟丽被它所掩。玉尔有感而言:“虽有刘应(Visdelou)及德经(de Guignes)诸人的‘自信不疑的考定’,但中国人自己对罗马帝国及其人民的看法,与叙述赛拉斯(Seres)的古典著作中所述的中国人的见解,有一些显著相同之点。”他又说:“在这个事例中,研究的大对象确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没有事实的错误,但其详述的,仅乃在东陲所见的偶然事迹,往往远不是对象的真正特点。”后面我就要表明,这些详细论述,只限于仅仅指帝国的东陲,而不是指整个帝国,那么这些论述足够精确,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特点;玉尔最末一句话中所提出的缺点,并非中国载籍本身所具有的缺点,而是那些坚持勉强把它们推及于整个罗马帝国的人的毛病。叙利亚与埃及既均为罗马的行省,中国史家所记该地的详细特点,自然会透露罗马人生活的痕迹;可以注意的,除了对这个地域的无可置疑的地形特色的叙述之外,在所有主要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东方的特色。

我曾满意地看到,这种研究的重要结果,从本书出书前所印样张所能受到的批述来说,颇为许多研究汉学的朋友赞许;如果在一般读者方面也能得到同样的观感,我将深以为幸,自然,我深知还有许多有待努力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限于我研究的范围,似乎超过我所有的条件,因此或者全未涉及,或者没有打算作明确的解决,我的同道们尽有从事研究得到解决的可能。

斐利普斯先生(Mr. Phillips)论及我的条支考说:“这是唯一我不能肯定接受的部分。有两件事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在所述的时代,Hira(旧译于罗国)是否为盛产犀牛之地?第二,西海是否可以指 Bahr Nedjef(内惹德河)?条支一地为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论大秦一稿中,也同你一样,考定斯宾为泰西封(Ktesiphon),而斯罗为塞琉西阿(Seleucia)。”

关于西海问题,我以为发源于卡尔提阿湖(Chaldaen Lake),由东而西,统

括诸水,名为西海。《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13卷,第358页)有一通讯读者,引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书(第1卷,第184页),谓在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统治以前,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经常泛滥于平原全地,汪汪如海。此外,马苏提(Masudi)(A. Sprenger的译本,第1卷,第358页)说:“幼发拉底河水曾有最大部分取道于于罗(el-Hirah);河床遗迹,也许仍可找到,它曾名为阿提克(Atik)(古代)。在奥马(Omar)时代,伊斯兰教徒与罗斯坦(Rostam)曾大战于此,称为卡提西亚之战(battle of el Kâdesiyah)。那时,幼发拉底河于今称为内惹德(en-Najaf, Nedjef)之地流入阿比西尼亚海(即印度洋,此处指波斯湾);海通到此地,驶往于罗国的中国和印度船舶都在此停泊。”在几页以后,马苏提又载阿拉伯征服者卡利德(Khaled)和一位于罗人的谈话。卡利德曾要求此城派一年高智慧之人到他的营幕去,欲询他们的情况。下面就是卡利德和那位于罗老人的会话:

“你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纳巴提安人(Nabathaeans)?”〔1〕

“我们是纳巴提安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纳巴提安人。”

“你们到这里有多少年了?”

“三百五十年。”

“请问你见过点什么?”

“我曾见海上的船满载信地(es-Sind)及印度的货物深入这个地方;在你足下的地方,从前都被浪所淹没。看,现在我们距海岸已有多远,等等。”

至于犀牛,《后汉书》谓条支国“出”师子(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无论把条支位于与上述之物有关的任何地方,或将条支的位置推到波斯湾海岸的更南端,都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难题;因为今天产生犀牛的国家,都完全不在问题之内。布累特奈得博士(Dr. Bretschneider,以后简称布氏)在《中日札记》(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4卷,第60页)中,欲将条支证为古波斯(苏撒 Susa,百泄波里 Persepolis),主张在这里,“犀牛”一词应该译成

〔1〕 夏德氏定卡尔提阿为条支,而纳巴提安为委铿(Rekem),即汉名的犁靛。二者之关系见于下文考证栏中。——译者

“水牛”，因亚洲西部盛产水牛。但水牛与犀牛不同之点甚大，中国的作者根据自己经验一定是熟知水牛的；而从古代或当时对安南种犀牛的详细记载，也知道犀牛的情状；我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作家会不能分别，混而为一。如果说我们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卡尔提阿曾经出产过犀牛，但我也不知道古代作者说过那里不出犀牛；因为今日所存的古代典籍，大都为信笔记载的性质，不能指望它们对每种兽类的产生区域都有详尽的描述。不论犀牛是否在卡尔提阿的动物中曾占有显著位置，但幼发拉底河下游附近曾经海潮泛滥的原隰，其为这种厚皮动物的良好产地，无疑不下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不完备的；我对中国古代记载的正确性的信念，通过我的研究，更加加强了，我认为记载中所谓条支出犀牛一点，正如提喜阿斯（Ktesias）、普林尼（Pliny）或斯特累培（Strabo）所述出现于卡尔提阿兽类的一样可靠。我们对于接近西方文明的那些国家的古代动物的知识是不是也有同样值得怀疑的地方呢？谁会到贝鲁特（Beirut）附近的黎巴嫩（Libanon）山穴中去寻求犀牛的遗骨呢？可是就在那里，实际却发现了和野牛、熊、山羊、瞪羚及羚羊等在一起的犀牛遗骨。[参看夫拉氏（Fraas）著《黎巴嫩山三月记》（Drie Monate im Libanon, Stuttgart, 1876 年，第 66 页）。]布利姆（Brehm）曾提到沙尔丁（Chardin）在伊思巴罕（Ispahan）见过一头犀牛（Thierleben, 第 3 卷，第 52 页），虽然我不能说明这种兽类怎么会到那个地方的。

此书付印时，深蒙翟理斯（H. A. Giles）及巴刻（E. H. Parker）二位先生的提示和协助，深为感谢。

夏德（F. Hirth）

1885 年 6 月于上海

导 言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当然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谢正史的编排体例,凡见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编集,按照地理区域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见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传,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题目的材料,是很费力的。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为 Ferghana)等列传。司马迁(约歿于公元前 85 年)的地理记载,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诸国。后来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汉书》。班固死于公元 92 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广泛得多的知

识。班氏关于地理各章,已有译文^[1]。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 102 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

《后汉书》为南朝宋(公元 420—479 年)人范晔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其中《西域传》,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项,并以同一或类似的题名见于后代的史书之中。

《后汉书·西域传》共有五百八十九字,为明代以前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次记载。书中所记关于大秦国的位置、边界、首都、人民、物产、工艺的许多事实,且不说由后来历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欧洲汉学家,不幸抱有偏见(他们认为大秦既为极西的最大强国,那么必然就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全境),本来就足够可以提供作为考定这个国家所在的基础。坚执此说的人,前有刘应及德经,近有布氏、爱德金斯(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须承认我一度曾抱有同样的偏见,两年前,我开始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之时,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为罗马及意大利之说。但不久我就发现,在把汉文记载仔细考察后,不但不能证明我先前的见解,反使我全部抛弃前说。在这些记载中提到“苏合”(Storax)的制造,罕柏理(Hanbary)曾经指出,苏合的制造历来就只限于利凡得(Levant,地中海及地中海东岸一带,特别指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带;又提到以水精(琉璃)及宝石为建筑物装饰品;外国使节从边界乘驿而诣王都;以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驿)为基础的军事制度;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使行人不得不结队而行。凡此各种证据,一经考究,不由不使人觉

[1] 卫礼(A. Wylie)在《人类学研究所学报》发表《匈奴与中国关系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第3卷,第401—452页;第5卷,第41—80页);《西南夷及朝鲜史》(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tau-seen)同上书,1879年8月号。《西域杂记》(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同上,1880年8月及1881年11月号。

得,大秦并非罗马本身,而是它东部的一省。

大家知道,在 7 至 8 世纪,景教已传入中国,在西安府附近立有景教碑,1625 年(明天启乙丑)出土,碑文说大秦乃其故邦,且有“室女诞圣于大秦”之语,这显然是指叙利亚。在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人根据这个证据,放弃以大秦为罗马之说,而赞成定为叙利亚,或叙利亚的一部分(即犹太 Judiea,巴勒斯坦 Palestine)。巴拉威(Paravey)^[1]于 1836 年采用此说,约 20 年后,卫礼(Wylie)^[2]和波提埃(Pauthier)^[3]亦然。但这三位汉学家立论的理由,主要以景教碑为根据。这些理由在那些认景教碑为伪作的人眼里是不能成立的,如本非汉学家的伏尔泰(Voltaire)和近日的芮农(Renan)。他们得到纽曼(K. F. Neumann)和儒莲(St. Julien)的支持,这两位如果不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抱有偏见,对这个问题本来可望有比较高明的见解的。我个人完全承认景教碑文的真实,除卫礼及卜铁所提出的理由,已经没有再提新的论据的必要。我所愿意做的,就是除景教碑外,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献中,搜集论据,以证明大秦即叙利亚,来填补二人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为了对我所用中文材料的来源作一概述,不可不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今本的《后汉书》并非完全出于范晔之手,其中《志书》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传》出自他的手笔。唐高宗(公元 650—683 年)命人为范书作注,迄今与正书并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旨在解释原书某些疑难的注文,在写作的年代上距范晔写作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4]关于《后汉书》传授的可靠性,我们必须知道,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间的几百年

[1] 《犹太古代象形文字新探》(Dissertation abrégée sur le Nom antique et hieroglyphique de la Judée)1836 年巴黎出版。

[2] 《西安府景教碑考》(On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egan-foo)发表于 1854 及 1855 年之《华北导报》(North-China Herald)。1855 及 1856 年重刊于《上海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 5 卷,第 275—336 页。

[3] 《西安府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é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1857 年巴黎出版及《西安府华叙碑文考》(L'Inscription syro-chinoise de Si-ngan-fou),1858 年巴黎版。

[4]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 191 卷,经籍十八引郡斋读书志:“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元等作注。”

中仅有抄本流传。我本人没有见到初刻本,^[1]但所见到的是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与《汉书》同时刻版,也可以称为最古版本之一。书共六十四卷,精印对折六开本;用最大的字体,印于具有水纹特色的白纸之上(没有后来所造纸张的横帘纹)。每页边缘有抄书人的姓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书人果亲王之章。此书当时售价为七百两,约等于一百七十五英镑。我曾将此本《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秦的文字与今本核对,除今本有一处漏去一“也”字,另一处将“师”字改为“狮”字外,自宋版以来内容没有变乱,使我很满意。我前面已经提到,此书在宋代以前,大概只有抄本,我们虽然无从追溯最初的原本,但是我们绝少可以怀疑传写真实性的理由,因为此篇所记者为一个远方的异国,传抄的人没有有意去作假的利害关系。



[1] 刻行于公元 1022 年,由判国子监孙奭主编。他以考证学得名(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第 15 卷,第 24 页)。他负责以秘府所藏的抄本与初刻本校勘订正。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变动,必因于一时的疏忽;中国的古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这种错误,但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的希腊罗马的经典编集中的错误要少得多。这一点,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历代受命掌管国家档案(它一定还包括以前历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国学者,在他们抄写工作中,不像僧侣那样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正因为我们希腊及拉丁文字中沿袭的错误层见迭出,才使语言学成为一种这样有用的科学。此外,中国的学者也不曾遇到这样的困难:欧洲古典文献的研究,经过几世纪销声匿迹以后,才开始重振旗鼓;这个时候重见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经残损,因而变成无法辨认,希腊和拉丁文的书写体都曾经过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像《汉书》一类的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所用书体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识的;最初抄写的字体,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并无多大不同,那个时候现行的所谓楷书体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并且注定将成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标准字体。王右军殁于公元379年,他的书法成为后世仿效的范本,今天想写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临摹;对熟谙近代文献的人看来,他的书体,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体一样,可以明白辨认。^[1]

《西域传》取材的主要来源,也应当像关于编年的各章一样,是当时史官所撰的日历。^[2] 史官对于朝政,也同当代都察院的御史们一样,对于政府的行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享有一种特有的便宜,即无须公开向皇帝面诤,而是笔之于书,把他们的历史记录,秘密保存起来。这些记录留传到后世史官发表之时,材料所描写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势,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无论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这一部分的国家档案。虽然往往有违反正规之举,但至少这是日历所根据的原则。

编年史中所记关于外国的资料,想必根据于到中国的外国人的陈述。来

[1] 纽曼怀疑景教碑的书法,谓为近体,不像千年前的笔迹,而以此碑为不足信据。芮农及儒莲也有同感。其实他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个没有专门训练的人眼里看来,很难看出那种字体与现行字体之间的差别;即唐代任何其他类似的书法与前代书法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我曾将景教碑拓本的一小部分,送给一位从未听到有景教碑一事的中国鉴赏家请他鉴定,他立即说:这是“唐笔”。即属于唐代的风格,并略具唐代书法中所采行的微小变化。

[2] 《文献通考》第51卷职官五史官。

华的外国人是否都持有本国君主的证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适当的审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似乎中国朝廷十分重视外国人带来京都的礼物,认为是一个外国使节的主要部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由远邦而至,携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贡使相待,认为可以增加大国的光荣。历代正史关于亚洲西部及中部各国的记载,表现有某种的统一性,对其中关于某些类的地理事实的描写,也有某种的规格。看来外国人来华或来华以前,须受某种的盘问,通过一位译人或几位译人(重译)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问题。例如,设有一个商人,由锡兰至安南,带有一懂得希腊语的锡兰译人同来(当时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腊语为贸易通用语),^[1]从这里,再携同一位谙熟锡兰语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华语的人,前往长安(或西安府);这几位译人在询问时可以担任传达翻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如下:(一)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二)在什么地方?(三)距离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属国?(六)都邑是怎样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国家有什么物产?等等。最后,关于你的国家你还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日历所载的来源,而我们现有《西域传》的记载,一定就以日历所记为根据。自然史家不会仅限于照抄而已。他们富有文才,并且作为熟悉历史格式的大师,就得把他们所接触的说得简略的事实,进行整理,使它成为一种叙述体的文字。这种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从其他来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开始有“又云”等字。特别是《后汉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能曾经吸收增补了当时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问的结果。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他只到临波斯湾的条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于红海口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th)的叙利亚港伊利安那(Aelana)有正常的海道贸易往来。甘英既与经常在这条海道上往来的船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自有搜集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情报的大好机会。除此以外,安息于罗马人复占叙利亚(公元前38年)以前,曾统治该地数年之

[1] 赖诺著:《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及商业关系》(Reineud,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 Empire Romain avec l' Asie Orientale)1863年巴黎版,第162页。

久,135年后,甘英使安息之时,从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关大秦的情报。在大秦物产通过安息人运入中国时,情况显然必是如此。

《三国志》是陈寿(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同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死约一百三十余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我不打算讨论《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倾向于相信原书已佚,我们只好满足于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些,更加可以征信,使我们可以设想,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起来源。我所要说的,马端临在此处,也同他的关于地理的记载一样,都没有注明取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裴注《三国志》对于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备,不下于《后汉书·西域传》。《魏略》中有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们即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不会重视这种撰述的。对于这些记载,我们除了承认关于属国的地理情况、方向、距离等方面存在某种混乱外,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记载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记录的可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国的古书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权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书,还要正确。特别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即近如埃德里斯(Edrisi)的地图,关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草图(1154年,见Pesehel, Gesch. d. Erdo, ed, Ruge, Munechen, 1877, 第145页),还是那样的离奇荒诞,远离事实。从马端临书中一部分根据于《魏略》,或与《魏略》极其相类的这一事实,表明卓有声誉的中国批评家,并不完全追随宫廷史官的先例。